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Distr.: General  
11 September 2015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 2393/2014 号来文

委员会第一一四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2015 年 6 月 29 日至 7 月 24 日)

提交人:	K (由 Marianne Volund 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丹麦
来文日期:	2014 年 5 月 19 日
参考文件:	特别报告员根据议事规则第 92 和 97 条作出的决定, 于 2014 年 6 月 16 日转交缔约国(未以文件形式印发)
意见的通过日期:	2015 年 7 月 16 日
事由:	将提交人驱逐回原籍国
程序性问题:	申诉证实程度; 基于属地和属物管辖原则不符合《公 约》条款
实质性问题:	禁止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见解和言论自由权
《公约》条款:	第七和第十九条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二条



## 附件

##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在第一一四届会议上

通过的关于

## 第 2393/2014 号来文的意见\*

提交人：K<sup>1</sup>（由 Marianne Volund 代理）  
 据称受害人：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丹麦  
 来文日期：2014 年 5 月 19 日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2015 年 7 月 16 日举行会议，

结束了对 K 先生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提交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第 2426/2014 号来文的审议工作，

考虑了来文提交人和缔约国向其提供的全部书面资料，

通过了如下意见：

##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提出的意见

1.1 来文提交人 K 先生是阿富汗国民，生于 1987 年 6 月 1 日。他现面临由丹麦遣返回阿富汗。他声称，他被迫返回阿富汗将涉及违反《公约》第七和第十九条。他由律师 Marianne Volund 代理。

1.2 2014 年 5 月 19 日，新来文和临时措施问题特别报告员代表委员会，请缔约国在委员会审议其来文期间不要将提交人遣返回阿富汗。5 月 20 日，缔约国对提交人暂停执行递解出境令。11 月 19 日，缔约国请求取消临时措施（见下文第 4.11 段）。

---

\* 参加审查本来文的委员会委员有：亚兹·本·阿舒尔、莱兹赫里·布齐德、艾哈迈德·阿明·法萨拉、奥利维耶·德弗鲁维尔、岩泽雄司、伊万娜·耶利奇、邓肯·穆胡穆扎·莱基、弗提尼·帕扎蒂斯、毛罗·波利蒂、奈杰尔·罗德利爵士、维克多·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雷夏、费边·奥马尔·萨尔维奥利、迪鲁杰拉尔·西图辛格、安雅·塞伯特佛尔、尤瓦尔·沙尼、康斯坦丁·瓦尔泽拉什维利和马戈·瓦特瓦尔。

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91 条，萨拉·克利夫兰没有参加本来文的审议工作。

<sup>1</sup> 提交人要求将其姓名保密。

2015 年 3 月 31 日，新来文和临时措施问题特别报告员决定拒绝取消临时措施的追求。

## 事实背景

2.1 提交人是阿富汗普什图族人，逊尼派穆斯林。2006 年 12 月至 2011 年 5 月期间，他担任驻阿富汗美军的口译员，确切而言其工作范围是在坎大哈省、努里斯坦省、贾拉拉巴德省和迈丹瓦尔达克省。<sup>2</sup> 他声称，在此期间，由于其为驻阿富汗美军工作而多次接到电话威胁。<sup>3</sup> 他说，塔利班在三个不同场合在街道上分发所谓的“恐吓信”，信上提到他的名字并称其为“叛徒”。提交人还指出，他的堂兄弟打电话给他父亲，说提交人“不应与异教徒合作”。

2.2 提交人称，正是这些威胁迫使他离开阿富汗。提交人合法前往德国参加一场研讨会，然后从德国前往丹麦，2011 年 5 月 30 日抵达丹麦。2011 年 6 月 1 日他在丹麦申请庇护。6 月 7 日他与丹麦警方面谈，6 月 9 日他在丹麦移民局填写了一份申请表。2012 年 1 月 4 日和 31 日，提交人与丹麦移民局进行了两次面谈。2012 年 2 月 17 日，丹麦移民局拒绝了提交人的庇护申请。

2.3 2013 年 6 月 24 日，难民上诉委员会驳回了提交人就丹麦移民局的决定提起的上诉。难民上诉委员会质疑提交人的可信度，称他在丹麦移民局面谈时以及在难民上诉委员会的听证过程中对多个问题的回答自相矛盾而且时而有所避忌。难民上诉委员会尤其指出，提交人在庇护申请中没有提到据称由塔利班发出的“恐吓信”，而且他在首次面谈时说“恐吓信”笼统地提及“那些与美国人合作的人”受到了严厉处罚。只有在难民上诉委员会的听证过程中，提交人称有三封“恐吓信”提到了他的名字。当问及这些说法不一致的地方以及他如何获知这些恐吓信时，提交人说他是在口译工作过程中偶然获知这些信件，他的解释有所避忌，难以令人信服。难民上诉委员会还质疑提交人关于威胁的说法，包括来自塔利班的电话威胁、来自当地居民的威胁以及提交人的堂兄弟通过他父亲发出的威胁。难民上诉委员会指出，在与丹麦移民局第二次面谈时，提交人称，他与当地居民存在冲突，他们指责口译员是杀戮的罪魁祸首，但他只是受到了“斥责”而已。后来在难民上诉委员会的听证过程中，提交人称他遭到当地居民的迫害。最后，难民上诉委员会发现提交人对其行程路线撒了谎，其实他是花钱请中介帮忙，他从未被签发护照。难民上诉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提交人对于寻求庇护原因的解釋不能作为给予庇护的正当理由。

<sup>2</sup> 提交人提供了一份美国国防部在阿富汗联合安全指挥部 2011 年 6 月 10 日的备忘录，通知 Mission Essential Personnel (为国防部提供服务并招募提交人的机构)在“不请假擅自离职”期限到期时归还提交人的护照。提交人还提供了用于支持签证申请的一位美国军队官员的推荐信。在这封信中，该官员正式确认他曾是提交人的直接领导，自从 2009 年 8 月这位美国官员离开阿富汗之后提交人仍与他以及区域部队顾问指挥中心(中部地区)保持联系，这位官员称，“据他了解，针对提交人的威胁已升级，因此，提交人作出决定，通过因公出差去德国而逃离阿富汗。”

<sup>3</sup> 没有提供关于这些所称威胁内容的准确资料。根据难民上诉委员会 2013 年 6 月 24 日所作决定中确立的事实背景，提交人称从 2008 或 2009 年至 2010 年年底之间收到大约 20 次威胁。此外，提交人称，自 2007 年直到他离开阿富汗，他的堂兄弟多次打电话给他父亲对其进行间接威胁。

2.4 提交人对难民上诉委员会在其陈述中发现的所谓不一致之处提出质疑。他承认在填写庇护申请表时忘记提及“恐吓信”，但他指出他后来联系了红十字会的一名代表并告知想要补充该信息。这位红十字会代表致电丹麦警方，并获悉任何补充资料应在与丹麦移民局面谈时提供。<sup>4</sup> 提交人还指出，在难民委员会的听证过程中，他对之前关于恐吓信的陈述作了补充，表示这些“恐吓信”中有三封列出了他的姓名并称其为叛徒。关于据称来自塔利班和当地居民的威胁，提交人称，他的陈述并不自相矛盾，这是翻译导致的问题，因为提交人认为“斥责相当于人身威胁”。至于据称堂兄弟的威胁，提交人指出，他第一次是说“亲属”，后来改成“堂兄弟”，这并不构成任何矛盾。最后，提交人指出，提供虚假的旅行路线不应被作为拒绝庇护申请的理由。

2.5 在 2014 年 4 月 4 日的一封信中，提交人要求难民上诉委员会重新审理其案件。难民上诉委员会通过 2014 年 5 月 19 日的决定拒绝该请求，指出提交人没有提交任何新的重要资料。因此难民上诉委员会认为没有理由重新启动程序或延长提交人离境的时限。难民上诉委员会指出，拒绝提交人庇护请求的决定是基于他的个人情况以及难民上诉委员会掌握的背景资料，包括阿富汗口译员的普遍境遇，并得出结论认为，提交人没有证明，如果将其遣返回阿富汗，仅仅因为他为国际部队担任过口译员，他就极有可能面临遭受塔利班或其他人的迫害或虐待的实际风险。

2.6 提交人称，根据《丹麦外国人法》，不能就难民上诉委员会的决定向国家法庭提起上诉，所以他已用尽所有国内补救办法。他指出，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在其关于丹麦第十七次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CERD/C/DEN/CO/17)中建议授予寻求庇护者对难民上诉委员会的决定提出上诉的权利（同上，第 13 段）。

## 申诉

3.1 提交人称，将他遣返回阿富汗将使他面临遭受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严重危险，违反了《公约》第七条。他声称，因其在阿富汗不同地区为美国军队工作了五年，他被塔利班视为叛徒，有可能面临塔利班和当地居民的攻击或虐待。来文人提到丹麦移民局赴喀布尔实况调查团的报告以支持其陈述，即在阿富汗为国际部队工作的西方公司的雇员面临遭受攻击或谋杀的高风险，尤其口译员面临很高的风险。<sup>5</sup>

3.2 提交人也声称将其遣返回阿富汗将违反《公约》第十九条。他指出，言论自由权包括在美国军队担任口译员的工作权，这被塔利班视为政治表达和叛国的行为。

<sup>4</sup> 提交人附上红十字会 S.M.E.的一封信，信上说明她曾协助提交人的申请，尤其是致电警方询问如何在申请中添加信息。

<sup>5</sup> 丹麦，丹麦移民局，《丹麦移民局赴喀布尔实况调查团报告：阿富汗：用于庇护确定程序的原籍国资料》，2012 年 2 月 25 日至 3 月 4 日。

##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

4.1 在 2014 年 11 月 19 日提交的材料中，缔约国对来文的可受理性和案情提出质疑。缔约国指出，为可受理之目的，提交人应确立表面上证据确凿的案件。缔约国称，提交人根据《公约》第七条提出的申诉显然缺乏根据，因此应以缺乏足够证据为由宣布不可受理。

4.2 关于提交人根据第十九条提出的申诉，缔约国指出，该申诉并非基于提交人据称在丹麦或丹麦管辖的领土内遭受的待遇。缔约国指出，丹麦不能为其他国家违反第十九条的行为承担责任。因此，缔约国认为，委员会对该申诉没有管辖权，应以不符合《公约》条款为由宣布其不可受理。缔约国援引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确立《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所载权利域外保护的特殊性质。<sup>6</sup> 缔约国还指出，委员会从未审议过担心其依据《公约》除第六和第七条之外其他条款应享有权利遭接受国侵犯的个人的遣返申诉。缔约国认为，如果有关个人担忧另一缔约国会侵犯其依据《公约》第十九条应享有权利，则引渡、驱逐、逐出或以其他方式遣返此相关个人不会造成第六条和第七条所设想的不可弥补的伤害。缔约国得出结论认为，来文这一部分应基于属地和属物理由被宣布为不可受理。

4.3 缔约国称，就算来文依据第七条被视为可受理，可提交人陈述的事实并未显示违反了该条款。

4.4 缔约国指出，在评估是否满足《丹麦外国人法》准予颁发居住证的条件时，<sup>7</sup> 难民上诉委员会考虑，如果当事人被遣返会原籍国，是否有充分理由担心会遭受某种程度的具体的个人迫害。为了确定此担忧是否有充分理由，难民上诉委员会考虑关于寻求庇护者在离开原籍国之前受迫害的资料，最重要的是，如果将寻求庇护者遣返回原籍国，他/她将面临怎样的个人境况。缔约国称，难民上诉委员会认为提交人关于其离开原籍国之前受到迫害的陈述不可信。缔约国还补充道，委员会未收到任何新的资料。

4.5 缔约国指出，难民上诉委员会确实认为以下是已证明的事实，即提交人被雇用成为驻阿富汗美国部队的口译员，因此他属于“可能遭受塔利班和其他抗击国际和阿富汗当局的团体虐待”的群体。但是，难民上诉委员会认为，这本身并不能作为颁发居留证的合理理由。在结合一般背景资料评估具体案情时，需确定如果提交人被遣返回阿富汗，他肯定会面临具体的遭受迫害的个人风险。缔约国援引欧洲人权法院对 H. 和 B. 诉联合王国案件的判决，该案件是关于一名阿富汗国民受雇担任驻阿富汗美国部队的口译员，提交人称因其在喀布尔的个人资料以及那里的安全形势，他在喀布尔会不安全，法院驳回了提交人的申诉。法院认为，不能仅仅因为提

<sup>6</sup> 缔约国援引法院在 1989 年 7 月 7 日 *Soering* 诉联合王国案件中的判决（申请号 14038/88）以及 2006 年 2 月 28 日 *Z. 和 T. 诉联合王国* 案件中关于可否受理的决定（申请号 27034/05）。

<sup>7</sup> 缔约国告知委员会，根据《丹麦外国人法》第 7 (1) 节，如果外国人属于《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规定的范围之内，则在提出申请后，可颁发居留证。根据《外国人法》第 7 (2) 节，如果外国人可能会面临死刑或遭受酷刑或虐待，也会向其颁发居留证。

交人之前担任过美国部队的口译员就认为他在喀布尔会面临风险，而应审查其案件的具体情况、他的人际关系的性质以及他的个人资料。法院得出结论认为，提交人未能证明将他遣返回阿富汗将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三条。<sup>8</sup>

4.6 在本案中，缔约国指出，提交人在丹麦警察面谈中及其庇护申请中都没有说，他收到了以“恐吓信”形式的任何具体威胁。在与丹麦移民局面谈过程中，提交人表示，他之前未提及这一点是因为他打算在与丹麦移民局面谈时提及。在难民上诉委员会的听证过程中，他说之所以没有填写这一点，是因为担心该信息“可能落入未经授权者手中”。在提交人向委员会提出的申诉中，他坚称在庇护申请过程中他忘记提供关于恐吓信的信息，但后来又联系了红十字会寻求帮助。此外，缔约国指出，提交人关于这些恐吓信的性质（是内容笼统还是具体提到提交人）、作者和来源的说法自相矛盾。在这方面，缔约国指出，提交人告知丹麦移民局是阿富汗军队分发了这些信件，但后来在难民上诉委员会的听证过程中，提交人却说是美国军队在街道上收集了这些信件。此外，在与丹麦移民局面谈时，提交人称，这些信件都由毛拉署名而且是在三个不同的省份发现的，但在同一次面谈中，他又说这些信件由指挥官 Baljol 署名而且都是在塔哈尔省发现的。缔约国认为，提交人关于其面临的具体威胁的陈述前后不一致。难民上诉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提交人关于“恐吓信”的陈述前后不一致，属于捏造。

4.7 缔约国称，提交人关于其在离开阿富汗之前经历的所谓“冲突”的陈述也前后不一致。在申请中，提交人表示他曾多次接到威胁电话，他的亲属和他的父亲也接到过威胁电话。在与丹麦移民局的面谈中，提交人称因口译工作的原因他与塔利班之间产生过冲突。在于丹麦移民局的第二次面谈中，提交人称，他也遭遇过个人冲突并收到当地居民的人身威胁。但是，提交人从未向难民上诉委员会提及他收到过来自当地居民的任何威胁。缔约国得出结论认为，在与丹麦当局的接触中，提交人关于其在阿富汗问题的陈述总是前后不一致。

4.8 最后，缔约国指出，难民上诉委员会认为，提交人关于其提供虚假旅行路线的理由没有说服力。

4.9 缔约国称，提交人试图利用委员会作为上诉机构，由委员会重新评估案件事实。缔约国指出，委员会应适当重视难民上诉委员会认定的事实，难民上诉委员会能够更好地评估提交人案件的实际情况。

4.10 缔约国还补充道，难民上诉委员会指派律师免费为寻求庇护者的申诉提供支持，难民上诉委员会的程序包括与寻求庇护者、其律师和口译员以及丹麦移民局代表进行口头听证。

4.11 缔约国告知委员会，在委员会申请临时措施后，难民上诉委员会中止了提交人离开丹麦的时限，直至收到进一步通知。基于上述情况，缔约国要求委员会审查其临时措施的请求。

<sup>8</sup> 2013 年 3 月 9 日判决（申请号 70073/10 和 44569/2011）

## 提交人关于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5.1 2015 年 3 月 27 日，提交人就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作出评论。提交人指出，缔约国没有提供任何新资料，证明有合理理由让新来文和临时措施问题特别报告员审查其准予采取临时措施的决定。

5.2 提交人强调，难民上诉委员会的决定是由其多数成员通过的，因此并非其所有成员同意这项决定。

5.3 缔约国表示提交人在其申请中写道其亲属收到了威胁，提交人对此说法提出质疑，他说其实他写的是他收到了来自亲属的威胁。

5.4 关于“恐吓信”，提交人坚持他没有提供自相矛盾的陈述。他指出，在他提交庇护申请表三天后，他参加了庇护中心的课程之后，他才知悉表格所载资料是保密的，这时候他就联系了红十字会并请求援助，帮他在申请表中加入遗漏的重要信息。提交人还补充说，在问讯期间向警察提供的信息不能作为可靠证据。提交人指出，在两位驻阿富汗美国官员的两封信中(附于提交人的首次来文)，他们证实提交人及其家人“面临许多威胁……因其受雇于美国和国际安全援助部队”，而且提交人已至少三次“通过恐吓信收到了来自塔利班的切实威胁”。

5.5 提交人指出，“难民上诉委员会”的英文翻译并不准确，因为它实际上是一个行政机构，而不是法院，其程序并不需要法律顾问协助寻求庇护者，会议都是非公开的，不允许证人出席(除非在几种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口译员不需要有任何具体培训，委员会 5 名成员中有 1 名由司法部任命。此外，不得就其决定向国家法院提起上诉。

##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 审议可否受理

6.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请求之前，人权事务委员会必须根据其议事规则第 93 条，决定来文是否符合《公约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6.2 委员会按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子)项要求，已确定同一事项不在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审查之中。

6.3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的陈述，即丹麦难民上诉委员会的决定不得上诉，因此国内补救办法都已用尽。缔约国没有就这一点提出质疑。因此，根据第五条第 2 款(丑)项，委员会认为国内补救办法已经用尽。

6.4 委员会认为，就受理性目的而言，提交人未能充分证实其申诉，即他被遣返回阿富汗将侵犯他依据《公约》第十九条应享有的言论自由权，特别是其作为驻阿富汗美国军队口译员的工作权。因此，委员会宣布，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来文的这一部分不可受理。

6.5 关于提交人根据第七条提出的申诉，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因来文缺乏足够证据而质疑其可受理性。但是，委员会注意到，为受理之目的，提交人基于其以往作为驻阿富汗美国军队口译员的经验，已经充分解释了他担心返回阿富汗可能会导致遭受违反《公约》第七条的待遇的理由。因此，委员会认为，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提交人依《公约》第七条提出的申诉可予受理。

6.6 委员会综合上宣布，来文由于涉及《公约》第七条下的问题，可予受理；并着手审议案情。

#### 审议案情

7.1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1款的规定，参照当事方提供的所有资料审议了本来文。

7.2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称，如果返回阿富汗，他有可能遭受塔利班和当地居民的虐待，因其在驻阿富汗美国军队担任了五年口译员，这将立即导致他被归类为叛徒。他声称，他在阿富汗多次收到来自塔利班、他的堂兄弟以及当地居民的威胁。提交人还援引丹麦移民局的报告，该报告确认为国际部队工作的口译员面临成为塔利班攻击目标的风险。缔约国对可受理性以及申诉的内容提出质疑，并基于数项理由认为提交人关于其在离开阿富汗之前据称收到威胁的说法前后不一致且不可信。难民上诉委员会 2013 年 6 月 24 日的决定也得出相同的结论。

7.3 委员会回顾其关于《公约》缔约国一般法律义务性质的第 31 号一般性意见，其中指出，如果有充分理由相信，在确实存在《公约》第六条和第七条所设想的不可弥补伤害的风险时，缔约国有义务不从其领土引渡、驱逐、逐出或以其他方式遣返有关个人。委员会还阐明，这必须是个人风险，<sup>9</sup> 而且为了确定是否存在无法弥补伤害的真实风险，应对提供实质性理由设定高标准。因此，必须审议所有相关事实和案情，包括提交人原籍国的普遍人权情况。<sup>10</sup>

7.4 委员会回顾，通常是由缔约国的机关审查案件的事实和证据，以确定是否存在这种风险，除非可以确定评估具有任意性或存在明显错误或执法不公。<sup>11</sup>

7.5 委员会注意到丹麦难民上诉委员会彻底审查了提交人的各项申诉，尤其分析了提交人据称在阿富汗收到的威胁，基于多项理由认为这些申诉前后不一致且不可信。提交人质疑难民上诉委员会对证据的评估以及得出的事实结论，但他没有解释为什么评估具有任意性或构成执法不公。

<sup>9</sup> 见第 2013/2272 号来文，P.T. 诉丹麦，2015 年 4 月 1 日通过的意见，第 7.2 段，以及第 2007/2010 号来文，X. 诉丹麦，2014 年 3 月 26 日通过的意见，第 9.2 段。

<sup>10</sup> 见第 2007/2010 号来文，X. 诉丹麦，第 9.2 段，以及第 1833/2008 号来文，X 诉瑞典，2011 年 11 月 1 日通过的意见，第 5.18 段。

<sup>11</sup> 见第 2272/2013 号来文，P.T. 诉丹麦，第 7.3 段；第 2053/2011 号来文，B.L. 诉澳大利亚，2014 年 10 月 16 日通过的意见，第 7.3 段；第 2049/2011 号来文，Z. 诉澳大利亚，2014 年 7 月 18 日通过的意见，第 9.3 段。



7.6 至于提交人关于难民上诉委员会诉讼程序缺乏保障的一般性陈述，委员会指出，提交人获得了律师的援助并在难民上诉委员会提供的口译员的协助下参加了口头听证。因此，委员会认为，提交人并没有以合理理由说明其案件中这些诉讼程序如何构成执法不公。

7.7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称，如果返回阿富汗，他将面临成为塔利班目标的风险。但是，委员会认为，提交人未能提供充分的理由支持其申诉，即如果返回阿富汗，仅因为他曾担任美国军队的口译员，他将面临人身风险。因此，委员会认为，提交人没有提供正当理由，说明将其遣返回阿富汗会使他面临无法弥补的伤害，进而违反《公约》第七条。

8. 人权事务委员会依《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4款行事，认为将提交人遣返回阿富汗，不侵犯他依据《公约》第七条应享有的权利。

---